

# 苏东解体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研究综述

李红亮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回顾苏东解体20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体系的相关研究,具体可分为4个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基本内容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本质和特征的探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实践发展的探讨;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当代价值的挖掘。

**关键词:**马恩政权思想;基本内容;本质和特征;实践发展;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4-0009-06

自苏东解体以来,政权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对政权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热点,许多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聚焦于政权问题,不断有相关的论文或论著问世,依据作者的广泛搜集,现将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综述如下。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基本思想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重新解析马恩政权革命方式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马恩只是在早期持暴力革命思想,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马恩政权革命思想前后有变化。如:刘天俊<sup>[1]</sup>认为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从19世纪40年代起,经早、中、晚3个时期。类似的研究有学者孙代尧的“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之探讨”<sup>[2]</sup>等。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有革命方式多样化思想,持此观点的有:张全景<sup>[3]</sup>、张飞岸<sup>[4]</sup>以及雷新宙的硕士论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sup>[5]</sup>。另有部分学者认同以下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存在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张有军<sup>[6]</sup>认为,普选权的实行,证明了只要善于利用,选举权就能够由历来是骗人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旧社会就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苏东巨变”之后,加大了对政权问题的相关研究。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取得

胜利和遭受挫折时都是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郭榛树<sup>[7]</sup>认为,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集中在两点:①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含义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指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亦即根本不入资本主义的门,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跨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算是“跨越”。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对此问题,学者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各种“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并非一切民族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即落后国家也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要把“跨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国内、国际条件;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跨越的,但发达的生产力却是无法跨越的,类似观点还有孙来斌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sup>[8]</sup>。另外,俞良早提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种新设想和新理论。<sup>[9]</sup>关于新设想和新理论的内容,即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表述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内涵、目

收稿日期:2013-10-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13SHD018)

作者简介:李红亮(1965—),女,山西运城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家政权、社会治理研究。

的、本质特征等方面。学界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争议颇大,主要分为三类:①无产阶级专政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董德刚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阶段之前,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本逻辑,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有3个基本特征:实行直接民主(普选制)、没有高薪和特权、没有常备军和国家官吏<sup>[10]</sup>。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远未完成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离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尚远。②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或者叫执掌政权,本质是民主共和国。对此,马瑾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在劳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目的也是要保卫民主果实,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和落脚点是民主<sup>[11]</sup>。洪韵珊认为无产阶级在执掌政权初期有一段需要大规模使用暴力的阶段,这是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小概念。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概念中只有一段时间具有专政的职能<sup>[12]</sup>。③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国家消亡理论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军队、警察和国家行政人员,非常类似于今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形式。另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把未来社会划分为3个阶段,并对三个阶段的关系、区别、特征作了系统的论述。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研究,以往学术界研究不够充分,没有将它放入应有的重要位置。张爱军等认为,巴黎公社人民在革命中确立了一系列民主政权原则<sup>[13]</sup>。程国林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是一个概括着国体民主、政体民主和政权民主的概念。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是政体的民主、形式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国体民主、政体民主和政权民主有机结合这样一种完整的民主形态<sup>[14]</sup>。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普遍性一面,却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学者们还具体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权思想以及分权思想。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扬弃,提出真正民主制的理想;通过社会收回权力,克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使国家从高踞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变为和社会一致、由社会支配、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近年来学界对共产主义社会及政权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例如学者李延明<sup>[15]</sup>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中完整地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设想的依据、共产主义设想的内容、共

产主义设想实现的条件、共产主义设想实现的途径等内容。另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思想的研究也很活跃。例如,宋凡金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sup>[16]</sup>;秦刚的《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sup>[17]</sup>。刘忠权认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是以强调国家建设为前提的,是从四种视角:人学视角(应然维度)、技术视角(实然维度)、犹太视角(文化渊源)、辩证法视角(方法论)共同论证国家的起源、消亡及其最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转变的过程<sup>[18]</sup>。王立民<sup>[19]</sup>认为,私有制和阶级必然灭亡,但不是同时、全部、立即灭亡,而只能是逐步消亡。

国外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更替方式的争论。例如,卡尔·马扎尼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希望》中研究了西方社会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与实践<sup>[20]</sup>。还有关于暴力革命原则,一直被视为“革命”和“修正”的分水岭<sup>[21]</sup>。一些学者实际对暴力革命原则持认可态度,即使西方学界绝大多数人认同“和平更替论”,另外一些自称属于新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共产党仍不同意放弃“暴力革命”的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弃暴力革命原则的思想倾向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已成主流,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是这样。这些政党普遍认为,人民可以通过参加议会斗争、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合法斗争去争取社会和人类的解放。坚持还是放弃暴力革命原则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本质和特征的探究

马克思反对将其思想体系化、固化和教条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而系统的政权学说。因而对于其中的规范性问题的探讨,如:本质问题、特征问题等,国内外研究就较少,只能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对于政权本质问题,孙伯鏊<sup>[22]</sup>认为,国家政权绝不是凌空独立的东西,其实不过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物质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赵崇华<sup>[23]</sup>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本质特征,但还比较抽象,并指出:马克思通过《法兰西内战》等著作,把巴黎公社革命中不自觉创造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倾向加以科学的理论概括和上升,从而形成了更为全面、更为具体的国家政权形式。王沪宁<sup>[24]</sup>对政权的主要特征,

如:民主性和终极性,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万斌等<sup>[25]</sup>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不过是完成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而已。马克思提出作为政治解放之超越的人类解放概念: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这些分析说明,马克思的政权思想具有创新性、民主性和过渡性、长期性。石德金<sup>[26]</sup>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相异化的力量,只有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

### 三、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实践发展探讨

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权革命的实践与发展研究,初步归纳,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列宁“一国胜利”论;民主与集中——代理人管理国家;突破“城市中心论”——中国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等5个方面。

学者俞良早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sup>[27]</sup>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未能就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作深入的研究,但他们在俄国社会政权发展途径能否不同于西方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特殊性,其革命应该分两步走。李心华等<sup>[28]</sup>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不是对立,而是继承与发展。奥古斯特·H·尼姆兹等<sup>[29]</sup>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列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晁秀棠<sup>[30]</sup>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指出了如下3方面的基本内容:①“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②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种手段”;③无产阶级民主也是要“消亡”。而在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贡献卓著者莫过于列宁。吴荣生等梳理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即从成立初期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权模式思想,笼统地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土地革命时期学习苏联,主张建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并付诸一定的实践尝试;再到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国共合作,提倡在全国建立容纳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根据地实行了“三三制”政权模式;最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sup>[31]</sup>。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斯大林模式制度性与根本性弊端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刘书林<sup>[32]</sup>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社会主义危机,是社会主

义的体制性危机,它包括外部体制危机和内部体制危机两个方面,社会主义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危机又促进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共产主义仍然活着,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也依然有生命力。在苏联,死亡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只要还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社会制度,全世界的劳动者就会联合起来,反抗唯利是图的社会制度。”<sup>[33]</sup>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所形成的中国模式,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成功的“扬弃”。

我们可以从部分学者对民主问题的研究间接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偏差问题。例如,陈学明<sup>[34]</sup>认为:罗莎·卢森堡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批评,即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从而堵塞了人民群众的积极的政治生活;批评苏维埃政权推行空想的普选权,从而使之成了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一纸空文”;批评苏维埃政权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从而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批评苏维埃政权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从而远离了社会主义。国外学者戴维·麦克莱伦通过前苏联政权丧失的教训间接地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模式内在民主的缺失性<sup>[35]</sup>。孙关宏等<sup>[36]</sup>认为,考茨基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 四、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当代价值挖掘

在全球化的当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权思想的价值、影响,又如何以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观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政权思想对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有何价值?陈文通<sup>[37]</sup>、洪光东<sup>[38]</sup>等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的阐发中,马克思从两个视角出发,形成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此划分能科学界定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方位。夏炎<sup>[39]</sup>并由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权性质的理论渊源。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还带有旧政权的痕迹,需要加强监督。邬思源<sup>[40]</sup>,和军<sup>[41]</sup>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确定的政治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即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分权制衡思想采取了理性态度,论证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必要性,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实践,提出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内监督的基本思想。另外,周岩<sup>[42]</sup>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一种新型国家形态,最大

的特征是政权性质的民主性。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重视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叶书宗<sup>[43]</sup>认为,“二战”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球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确立起斯大林模式。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改革斯大林模式已经成为各国社会主义的共同历史使命。王浩斌<sup>[44]</sup>也认为,拟苏联模式在政治上建立集权型行政管理体制,是中国政权的最初模式,但拟苏联模式也具有很大的弊端。房宁<sup>[45]</sup>、王惠岩<sup>[46]</sup>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文晓明等<sup>[47]</sup>则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做了研究。个别学者还从中国民主建设教训的角度作了探讨,成林萍<sup>[48]</sup>认为,“大民主”是毛泽东在晚年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民主理论,存在严重误区。近年来,国外学者也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另外,奥塔·希克的《共产主义政权体系》<sup>[49]</sup>对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重大基本问题,诸如民主、正义、自由、人权,以及“世界共和国”等这样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极有价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政治发展需要建立多方面的国际保障机制,要让世界各国人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需要性和有效性,中国也要提高学习借鉴他国政治制度建设成果的能力。

马克思“两个绝不会”思想是对其“两个必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重新认识马克思“两个绝不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左派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总体来看研究还有待深入,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端正对西方左派的态度,改善对西方左派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讲,学者们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将其粗略地归纳为3个时期:第一,伯恩斯坦构建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各国社会党纷纷加入本国政府的时期;第二,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的时期;第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以托厄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自由主义化”,以适应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学者纷纷探讨了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并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持此观点的有徐崇温<sup>[50]</sup>、张传鹤<sup>[51]</sup>等。

对于当代一个地球,两种制度的政权关系,该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坚持“和谐”相处

的观点。刘海岸<sup>[52]</sup>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之间的激烈冲突催生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和谐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冲突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戚兴元<sup>[53]</sup>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它不同于苏联时期搞对外争霸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和平社会主义是目标、政策和实践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是反霸权的社会主义,具有真实性和持久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共产主义政权思想意义深远。对此,学者们深入挖掘了其深层价值,认为一球“两制”有着世界历史性的共同基础。丰子义<sup>[54]</sup>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胡建<sup>[55]</sup>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意义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在本质上否定资本主义,但因其所处的社会存在基础尚未超越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因此它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据此,我国制定的政治发展战略,就不应是彻底否定资本逻辑的“纯粹社会主义”性质,而应是仍然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自身,并据此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合历史规律”的产物。罗文东<sup>[56]</sup>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与加深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恢复与增强,必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高涨创造条件,理性思考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韩云川<sup>[57]</sup>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既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要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是使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人的自由发展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充足的时间保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或说共产主义正在实现中。在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主义必然形成一种新的形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充分吸收世界资本主义业已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 五、展 望

总之,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推进,国内外的学者逐步开始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权思想,尤其是关于其中的民主政权思想。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探讨之所以至今才得以澄清,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本身的博大精深之外,还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认识论根源。尽管当今时代依然存在

着诸多方面的干扰和掣肘,但是,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把握愈来愈精准。在排除了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形之下,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从多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及其实践价值予以阐释。

当然,从中也看到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证明,虽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寻找源头的明确意向,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缺乏系统的阐释。其次,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当代发展及趋向缺乏必要的研究,尚未形成一条明晰的脉络与线索。最后,对构建中国社会初级阶段民主政权的重大战略决策,缺乏从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视角来论证其科学性的理论自觉,从而使之不能得到合理性的说明。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面临的各种挑战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既不能在理论上予以正当的回应,又不能在实践中彰显马克思恩格斯政权思想的价值。

#### 参考文献:

[1] 刘天俊. 恩格斯早期革命策略思想[J]. 社会科学研究, 1991(6):111-115.

[2] 孙代尧. 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之探讨[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0(6):745-751.

[3] 张全景.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学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J]. 求是,2007(11):45-48.

[4] 张飞岸. 恩格斯晚年的合法斗争思想:关于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7):84-88.

[5] 雷新宙.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6] 张有军. 恩格斯“和平长入新社会”思想探析[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9-11.

[7] 郭榛树. 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动态,1997(3):1-4.

[8] 孙来斌,居继青.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述评[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2):121-125.

[9] 俞良早.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3-16.

[10] 董德刚.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J]. 理论视野,2009(5):10-13.

[11] 马瑾,郭德厚. 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化[J]. 西安社会科学,2009(9):59-63.

[12] 洪韵珊.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和现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30.

[13] 张爱军,孙贵勇. 重新审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3):67-75.

[14] 程国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4.

[15] 李延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世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0-123.

[16] 宋凡金.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J]. 齐鲁学刊,2005(2):133-136.

[17] 秦刚. 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J]. 理论前沿,1999(22):21-22.

[18] 刘忠权. 国家构建与国家潜在自主性:重读斯科克族《国家与革命》[J]. 学术论坛,2002(2):53-56.

[19] 王立民. 论暴力、国家和阶级的产生与消亡[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51-58.

[20] 卡尔·马扎尼. 欧洲共产主义的希望[M]. 吴章彬,刘芸影,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0.

[21] 曾枝盛. 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几个热点问题研究综述[J]. 教学与研究,1999(4):47-52.

[22] 孙伯鏊.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302-303.

[23] 赵崇华.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政权思想[J]. 求索,2004(3):86-89.

[24]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1.

[25] 万斌,郁建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52.

[26] 石德金.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实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观[J]. 现代哲学,2008(2):7-13.

[27] 俞良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4):39-43.

[28] 李心华,孙绳山.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论”的再探讨[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22-27.

[29] 奥古斯特·H·尼姆兹,李百玲. 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11-18.

[30] 晁秀棠. 列宁在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上的贡献与不足[J]. 理论导刊,1988(12):18-19.

[31] 吴荣生,孙晓华. 马克思主义政权模式的中国化探索[J]. 消费导刊,2008(2):224-229.

[32] 刘书林. “非斯大林化”与苏联的解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5):59-66.

[33] 王瑾.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状况简介[J]. 教学与研究,1995(2):72-75.

[34] 陈学明. 评罗莎·卢森堡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J]. 学海,2009(2):72-79.

[35] 戴维·麦克莱兰.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 李智,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9.

[36] 孙关宏,王向民,梁莉. 理论与历史:逻辑的错位:再论

考茨基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2):42-48.

[37] 陈文通. 如何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J]. 科学社会主义, 2010(1):37-42.

[38] 洪光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视角[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4):78-82.

[39] 夏炎.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反思[J]. 延边党校学报, 2011(4):17-19.

[40] 邬思源. 论马克思恩格斯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J]. 求实, 2008(6):22-25.

[41] 和军.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3):162-164.

[42] 周岩.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权力监督思想[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2(6):68-70.

[43] 叶书宗. 改革开放:破斯大林模式樊篱,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0(5):29-37.

[44] 王浩斌. 新中国初期拟苏联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弊端[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0(1):105-108.

[45] 房宁. 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28-93.

[46] 王惠岩.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2-55.

[47] 文晓明, 王立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38-302.

[48] 成林萍. 毛泽东“大民主”观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启示[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4):51-53.

[49] 奥塔·希克. 共产主义政权体系[M]. 蔡慧梅, 谭美华, 王建众,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11.

[50] 徐崇温.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1-35.

[51] 张传鹤. 全球视野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1-97.

[52] 刘海岸. 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8.

[53] 戚兴元. 和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0(4):13-16.

[54] 丰子义. “世界历史”探索与唯物史观研究:从当代全球化的视角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115-122.

[55] 胡建. 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对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再认识[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7):71-79.

[56] 罗文东.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9(1):56-63.

[57] 韩云川. 社会主义再定义[J]. 科学社会主义, 2008(5):44-47.

(上接第8页)

总之, 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对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前后相承, 始终对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对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问题, 马克思强调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 要求具体分析每个国家所处当时的历史环境, 把握时代的发展特点, 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这一思想也启示我们,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有其历史必然性。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 陕西师大等院校. 国际共产主义共运史:上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13.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49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8.

[6] 朱德生, 李真. 简明欧洲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10.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8.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65.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12.